

日晷装反,兹事体大

玉渊杂谭

张景阳

西安古城南门的日晷装反了,而且一反就是一年多。事件引起国人热议,有讽刺,有戏谑。当然,更多的是对如何端正“尊重历史、传承文化”态度的理性思考。笔者以为,这种思考甚为必要。

要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的灵魂和力量源泉。以此为据,日晷装反,事件虽小,兹事体大。事件发生一年之久都未得到妥善解决,主

管部门有两个知识点需要补课。

一是补态度课。日晷是古代人类的伟大发明,也是人类研究天文的原始基础之一,时至今日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而当地管理部门面对日晷装反的质疑,未能及时纠正的理由是,因日晷与石像一体,要改日晷,需重做石像,其环节复杂,故久未更正。想来,其中有没有怕麻烦的心理,就不得而知了。

这不禁令笔者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元代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的故居,因不在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之内,而面临故居遗址与土地规划开发、土地使用权归属的矛盾冲突,正被规划建住宅。这两件事,反映的其实

是同一态度问题:在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经济利益面前,是考虑短期利益,还是长期价值?

二是补细节意识课。保护文化遗产,要用严谨的态度去从事相关工作,否则,轻则闹出笑话,重则毒害文化。笔者想起在五丈原武侯祠看到的一幕。祠中有碑林游廊,摆放着历代纪念诸葛亮的碑刻题咏。观赏碑刻,本是游览祠堂古迹的重头戏,该祠的陈列设置,却令游览者有些哭笑不得。诗圣杜甫的“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后,陈列的却是与武侯品格毫不相干的“难得糊涂”“吃亏是福”等碑,让游览者忍俊不禁,又觉大煞风景。一

云的名字

字里行间

刘园园



作者:[英]加文·普雷特-平尼 译者:王燕平、张超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恰巧那时和船舶气象保障员一起在科考船上值班,通过他的科普,我对云的认识终于有机会小小地跨越一步。比如那些海面上的深色“蘑菇”源于海水蒸发,它们叫积雨云,其出现很可能为不远处带来一场降雨。而飘在高空中的云絮叫卷云,它们通常预示晴朗的好天气。

这小小的进步撬动了更大的看云兴趣。回到陆地不久,便偶遇《云彩收集者手册》。翻看《云彩收集者手册》的过程,也是云彩扫盲的过程。云的名字远比想象的复杂。它们可以按高度分为低云族、中云族、高云族等,每个云族下面又有不同的属,比如高云族又分为卷云、卷层云、卷积云;每个属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种,比如卷云可以分为毛卷云、钩卷云、密卷云等等;不同的种还有变种。

每一种云的背后又包含很丰富的信息。比如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管状云,它的下方与宽阔的水域相接时,会将底部的空气向上吸附到云彩中,形成水龙卷,也就是所谓的“龙吸水”现象。遇到管状云时,最好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有可能带来龙卷风。

总之,就像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搞分类学研究一样,要真从云的看客转变为一个真正的云彩爱好者,看样子还得拿出点科学精神来。好在这本小册子对每一种云不仅有详细的文字介绍,还会配上云彩爱好者们在全球各地拍摄的照片,可以一边翻看,一边对照图文回忆曾经看过的云。

像我这样的“云盲”完全可以把《云彩收集者手册》当做云彩辞典来用。遇到常见的云,查一下这本小册子,可以连蒙带猜推断出云的名字。“云盲”以上的云彩爱好者,则可以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去收集云彩,也就是拍摄云的照片,记录拍摄时间和地点,辨别它的类型并描述它。

其实把这本书从头看到尾之后,最大的感慨是,要想叫出每一片云的名字,真不是什么容易事。别的不用说,从手机相册里随意翻出几张云的照片,对照《云彩收集者手册》抓耳挠腮,一番比较之后,还是很难胸有成竹地给它们指派名字。

这也难怪。相对于云的幻化无穷,任何企图对它进行分类并赋予它名字的尝试都会遭遇捉襟见肘的尴尬。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更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两片云彩。

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晒云,赶紧把照片放大。只见一条条云带的形状,像杂技演员朝不同方向抛出的丝带,一个名词从脑中疾闪而过——辐辏状云!

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云彩面前,除了默默点赞,或感叹一句“好漂亮的云”,还能说出它的名字。

要说看云,人人都堪称资深看客。不过看完加文·普雷特-平尼的《云彩收集者手册》,我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看了二十多年云,却依然停留在“云盲”水平。因为我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对云是不公平的。世界上的花鸟鱼虫、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都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名字,但千变万化的云却常被简单粗暴地以一个字来概括。

云确实是有名字的,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两个多月前在西南印度洋参加大洋科考时。科考船上生活单调,工作之余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是在甲板上看看海,顺便也看看云。目之所及,除了海就是天,没有高楼大厦碍事,云似乎有更多发挥空间,在我们这些看客面前坦坦荡荡展露无遗。

看得久了,突然有一天察觉,海上的云和陆地上的云好像有点不一样。海上的云常常特别低,特别厚,特别多。它们很多时候像一片片深色蘑菇浮在远处的海面上,就像刚刚从海里长出来一样。还有一些时候,它们在天上飘飘荡荡,绚丽异常,用语言难以形容。

摄手作

蓝,另一种蓝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我需要天空 一片被微风吹淡的蓝色 让诗句渐渐展开

杨奕华摄

马一浮谈“六艺”与国学

桂下漫笔

陈静

1936年初,刚就任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想聘用一位学者到浙大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并很快就在心中有了合适的人选——马一浮。

与熊十力、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新儒家三圣”(或“现代三圣”)的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在当地有“神童”“怪兽”之称。1898年,15岁的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一同参加了绍兴(当时称为会稽)县试,三人同中秀才,马一浮名列榜首。主考官寿潜更是在看了马一浮的应试文章后,对其才学大为赞赏,将爱女汤仪嫁与他为妻。除了自幼熟读儒家典籍,马一浮还精通

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对欧美文学、史学、哲学都有涉猎。马一浮曾于1902—1904年间赴美、英、德、日等国或工作,或游学,接受过欧美风雨的沐浴,是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博学者之一。

从海外归国之后,马一浮借居杭州广化寺,一边从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工作,一边专心阅读儒释道典籍。据说其在西湖水阁,用时三载,遍读《四库全书》。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只是后人的溢美之词。事实真相不得而知,但马一浮的阅读量之大是得到过友人的认定的。弘一大师李叔同曾对弟子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丰子恺开始并不相信,但后来与马一浮交往多了,才发现是确有其事,而且马一浮“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虽然竺可桢属意马一浮来浙江大学开讲国学,但其邀请马一浮的过程颇为曲折。马一浮一向学心,心无旁骛,所以直至竺可桢“三顾茅庐”之后,在1938年4月,马一浮才正式在已经搬迁到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讲授“国学讲座”。

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每周一次,讲论自由。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论”,即马一浮提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言论。“六艺”即“六经”,也就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马一浮认为六艺并不仅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所以他更喜欢用“六艺”来指代它们。

为什么他要大力推崇“六艺”?马一浮认为,“六艺”可以统摄中国文化,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我们的一切学术都出自“六艺”,其余的都是六艺的支流。不仅如此,“六艺”也可以统摄西方学术。比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

法律经济统于书礼”。西方的文化艺术最为追求“真、善、美”三种价值,而这三种价值在“六艺”之中都有表现——“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

所以,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的心灵,全部人类的生活,其实都是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的,只要天地不消亡,“六艺”之道就不会断绝,只要“六艺”不断绝,人类便可以依靠它走向光明。

马一浮在浙大的讲学深受师生的欢迎,校长竺可桢也曾数次前往听讲。不少浙大教师听了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受益匪浅,有的教师认为是“得当代大师之启导”,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升华,而有的教师甚至认为自己听了马一浮的讲学,找到了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他在泰和浙大讲学的讲稿后来汇编成《泰和会语》,其所提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言论,被后代学者认为是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之一。

青史何须镀金辉

——记几位对“束星北现象”发声的科学史家

科海钩沉

史晓雷



束星北(中)夫妇和女儿束美新合影

今年4月,在一次纪念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上,早年受叶先生亲炙的物理学家戴念祖谈到一件令人反感的事。他大意是说,这些年谈叶先生的书和文章多了,是好事,但有一种现象要不得,就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比如说文革期间叶先生沦落到在街头流浪要饭,完全是子虚乌有。如果任凭这种随意杜撰、添油加醋的写作泛滥,对严肃的科学史研究以及面向公众

的科普教育,都是一种严重戕害。笔者不禁回想起十几年前一部引发学界众多质疑的科学史传记《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以下简称《束档》)。

严格说,《束档》并非一本学术传记,而是一部传记文学,但传记文学几个基本特征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其余的文学性、艺术性等均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与再创作。可该书的封底这样写道:他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他的理论物理学修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内难有比肩者;他的教育才华也无人可以企及。当年国内几位科学史家实在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不能胡乱地给历史人物贴金。按照发文的时间顺序,对该书提出强烈质疑的三位科学史家分别是樊洪业、许良英和关洪。樊是近现代科学史家,许和关是物理学史家。三位专家均严重质疑该书提到的束星北与爱因斯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许良英早在1993年就提出过。

原来,1993年是束星北逝世10周年,其故乡江苏丹阳县专门编印了一本《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小册子,其中收录有许良英写的《忆束星北先生》。这本册子的附录同时收录有许良英质

疑束星北曾担任爱因斯坦助手一说的一封信,主要质疑的是1979年束星北署名(其实是口述,记者采访)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同时在附录中收录了核物理学家李寿彬为束星北辩护的一篇文章。可见,在《束档》出版之前,事件真伪至少存有争议。尽管《束档》有意回避了束星北是否担任过爱因斯坦助手这一问题,但就两者的交往,仍采用了束星北口述文章的说法,倾向性很明显。

其实在《束档》出版之前,有关束星北是否担任过爱因斯坦助手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1997年,许良英收到科学史学者胡大年查阅爱因斯坦档案时发现的一封信,是1943年束星北在湘潭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件,信开头的第一句便是:很遗憾我无缘与您相识,但从我孩童时代到如今研究自然科学,您在自然哲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激励着我(笔者译)。束星北声称在爱因斯坦身边的日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如果事情属实的话,1943年这封信开头的这句话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如今,爱因斯坦的档案已全部在线公开,这件档案随时被人可以查阅、核实。任何人在这一问题如果再为束星北辩护,都显得苍白

无力。

关洪则直接指出,《束档》是一部浮夸的科学史传记,特别提到为了拔高束星北,在一次次普通的学术交流中,采取了丑化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专家王竹溪的手法,以“美化”束星北。类似的例子还有,谈物理成就,说他不下于王淦昌;说科学素养,称他不逊色于苏步青。此外,胡乱地为传主戴高帽,诸如“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大师”云云。学界为此集体愤怒,自在情理之中。

科学史传记,即便是传记文学,也应秉笔直书,何况对束星北这样一位深深打上历史烙印、卷入历史洪流的物理学家,其命运与历史交织的真实故事足以令人扼腕、打动人心,而不需要任何矫饰与装扮,更不能为了造神把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踩在脚下。值得称道的是,像樊洪业、许良英和关洪这样的科学史家(特别是许良英,本身还是束星北的学生),秉持“求真”的科学精神,表现了他们敢于批评、勇于担当的可贵品质。弘扬科学精神,必须牢牢把握其最本质的“求真”精神,挖掘科学故事,不容青史尽成灰;书写科学人物,青史何须镀金辉。

留白的茶藤

物种笔记

杨仑



古人是不大喜欢茶藤花的。概因其花期特晚,每每在春尽之期。茶藤开后,那生机勃勃、满怀憧憬的春天就结束了。苏轼说“茶藤不春争春,寂寞开最晚”,“任是无情也动人”的牡丹,“莫怨东风当自嗟”的芙蓉都让钗黛各个满意,唯独轮到麝月,抽到“韶华胜极”的茶藤,却让宝玉愁眉苦脸地蹙了起来。

我却是极喜欢茶藤的。茶藤花开起来绝美,繁花累累欲坠,如重峦叠嶂。花色如凝脂,花瓣薄如纸,那股由内而外的纯洁倚天壁立,娇可照人。最妙的是,如玉的花,如娥的叶,如丝的蕊,尽管颜色若有似无,但大面积的留白反而更显花品的庄严圣洁。

先民深得留白之妙。譬如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画取自唐朝宗元的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数尺大的画面,内容却有寥寥几笔,一叶扁舟、一个老翁,一条尾梢微微上扬的小船。除此之外,只有船边淡墨勾勒的几笔水波,其余位置全是留白。

画面上的留白,非但不显得仓促,反而似有浩瀚无尽的江水,观之寒气逼人,那苍茫辽阔的天地、万籁俱寂的声调、凄凉淡漠的意境跃然纸上。相比于西方油画繁复铺陈、充盈画面,这种充

满东方禅意的留白,给人以无限想象空间,这便是留白的妙用。

不止是画,留白已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骨髓中了。画如此,文亦如此,戏剧亦如此。民国四公子之一、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浪迹沪上,以诗酒自娱。寒云才气逼人,且雅擅昆曲。他曾登台演唱《千字文·暗惨》:“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历尽了渺渺征途,漠漠平林,金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惨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当袁寒云唱到这段时,身世之感,家国之悲源源而至,收句之后,他会留有一段空,留给观众欣赏、品味的空间。据说,听了这场戏,凄凄涕下者非止一人,并有口皆碑:袁寒云表演此剧,远胜于其他名角。

留白,留的是绵长不绝的余韵,留的是物我之间、历史与时空之间交融的情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到花事的茶藤花可算是深得留白之精髓了。花谢了,它留给人们关于下一次花期的期许与祈盼。正如《说文》有云:“艸为春门,万物已出。艸为秋门,万物已入。”繁华虽去,另一番景色正好,正所谓茶藤开后更有余香,又何可悲伤?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

